

楚辞论稿

(增订本)

李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辞赋学

楚辞论稿

(增订本)

李 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 龄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文湛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论稿：增订本 / 李诚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78-371-9

I. 楚... II. 李... III. 楚辞—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177 号

书 名：楚辞论稿（增订本）
作 者：李诚 著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6.375
字 数：38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38.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目 录

第一编 骚人作品论

第一章 屈原论	2
第一节 三闾大夫与左徒	2
第二节 内政外交中的“疏”与“放”	9
第三节 忠君与爱国	24
第四节 修养与个性	32
第二章 宋、唐、景诸论	43
第一节 宋玉：生平与作品	43
第二节 宋玉：儒、法、道	53
第三节 宋玉：骚与赋	62
第四节 唐勒：残赋、道家与登徒子	74
第五节 景差：文献的空白	85
第三章 汉人拟楚辞诸论	88
第一节 拟楚辞论：以贾谊为中心	88
第二节 拟楚辞论：以严、东方、王、刘、王为中心	94
第三节 拟楚辞论：以刘安为中心	102
第四节 拟楚辞论：文献价值	113

第二编 屈骚文心论

第四章 屈骚中的材料	136
第一节 经典与民俗	136

第二节 角色与地域	145
第三节 传承与时代	155
第四节 贤人与明君	169
第五节 理想与遭遇	189
第五章 屈骚创作构思论	205
第一节 从《诗》到骚	205
第二节 从文学到宗教祭祀	225
第三节 从宗教祭祀到文学	242
第六章 屈骚创作结构论	253
第一节 《九歌》空间结构	253
第二节 《离骚》时空结构	263
第三节 《九章》时间结构	267
第四节 《招魂》与《大招》对立统一结构	274
第五节 《远游》与《离骚》对立统一结构	285
第六节 《卜居》与《渔父》对立统一结构	291
第七节 屈骚结构经纬	294
第七章 屈骚创作美学论	307
第一节 屈骚美善论	307
第二节 屈骚审美论	316

第三编 屈骚神话论

第八章 神话与历史	324
第一节 共工与鲧：选择神话	324
第二节 羲和：保持神话	344
第三节 羿与河伯：剥离神话	349
第四节 屈骚神话的非历史化	362
第九章 神话与血缘	371

第一节	高阳苗裔与氏族	371
第二节	屈骚中的龙凤	378
第三节	屈骚诸神与凤	383
第四节	屈骚诸神与龙	411
第五节	文献中的龙凤	420
第六节	屈骚神话的血缘	436

第四编 屈骚批评论

第十章	两汉评屈	460
第一节	屈原批评之争	460
第二节	屈骚批评之争	469
第十一章	刘安《离骚传》	475
第一节	《离骚传》的个人感情色彩	475
第二节	《离骚传》的政治色彩	479
第三节	《离骚传》的流传	487
第十二章	班固《离骚序》与《离骚赞序》	499
第一节	班固评屈骚	499
第二节	班固评屈原	506
后 记		518

第一编 骚人作品论

中国的文人创作，公认是从屈原开始的。这样说的含义，首先指在作品上自觉地署上诗人个人的姓名；其次（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是这些作品仅仅属于这一个诗人，是诗人个性的产物和标志。因此对作品的任何批评，也就意味着对诗人个性的批评和评价。就楚辞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的创作而言，自屈原开始，其后有宋玉师从屈原；再后出现了唐勒、景差，以及汉初的一大群刻意模拟屈骚的诗人。因而产生了《楚辞》这样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总集。如前所说，对作品的任何批评，也就意味着对诗人个性的批评和评价，反之亦如是，任何对诗人的评价和批评，都应该首先立足于作品本身的发掘，钻研。但遗憾的是，许多年来，将屈原作为政治、人格楷模颂扬的多，而将其作为诗人加以研究的少；对宋、唐、景以及汉代模拟屈骚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那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的作品价值究竟又如何呢？我想就此专辟一编以论之。

第一章 屈原论

第一节 三闾大夫与左徒

屈原生平材料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史料性者，如《史记·屈原列传》（及其中刘安《离骚传》）、《史记·楚世家》、刘向《新序·节士》以及班固、王逸诸人所作《离骚序》等；^① 一类为文学性者，如屈骚、汉人所作辞赋等。其中勾稽最困难也最有价值者，自然为屈骚本身。《离骚》自叙身世、生辰为大家所公认固不待言，《九章》等也不乏这类情况。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谨慎地勾勒出屈原生平行事的大致轮廓。

屈原相传名平，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前 342）夏历正月二十六日。^② 屈氏本为楚国王族，至屈原之时，与王室关系已颇为疏远，因而诚如东方朔《七谏》所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所谓“原野”当即指今湖北秭归。其地传说为屈原乡里，有关屈原传说，附会极多。考虑到楚民族是在睢山、荆山一带休养生息，逐步壮大的，其地正近秭归。自兹以下，沿长江两岸直至楚都江陵，楚公族陵墓遗迹不绝，因而作为衰落的王族后裔，屈原乃在僻远之地长大是完全可能的。屈原自己

① 一般认为《新序》为汉人杂纂，不足为史料。但赵逵夫先生却认为是书极具史料价值。参见其《庄辛〈谏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载《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此用汤炳正师说。参见其《屈骚新探·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齐鲁书社 1984 年版（下引此书同）。

在《九章·惜诵》中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似乎亦证实了这一点。他或许曾经历过比较能接近下层阶级的生活，能从底层痛切地感到“举贤授能”、立法遵道等治国措施的急切和必要，他也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从小就立下了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志向……这些，都可以从他后来的主张、行事和诗歌中感受出来。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得其详了。

正是由于屈原出身贵族，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青年时代即已供职楚国宫廷。他所担任的职务，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屈原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是，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而王逸《楚辞章句》则说是

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

显而易见，王逸与司马迁的说法不乏相似之处，甚至措词也相近，很容易使人不经意地视这种一致为王逸抄撮《史记》的结果。但是两人之说亦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既然“抄撮”，王逸为何要坚持那些《史记》中没有的说法，如“掌王族三姓”之类？为什么王逸不接过司马迁现成的说法“为楚怀王左徒”，而要独出心裁说“为三闾大夫”？如果更进一步将上面述及屈原官职的王逸、司马迁两段话加以对比，不难看出，王逸多出了司马迁“掌王族三姓”、“监察群下”等几句话。即使两人大体相同的一段，也有微妙的差别，司马迁之说，一“入”一

“出”乃以楚国为限，见出屈原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担负有重大职责；王逸之文，一“入”一“出”则以朝廷为限，就整体而言，似乎于屈原在内政方面的作用言之更详。如果通观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与王逸《离骚序》全文，则读者对于两文在重点上的差别应看得更清楚：司马迁文在除去两大段刘安《离骚传》以及《渔父》、《怀沙》两文后，^① 记叙的重点在屈原与楚国的外交方面；王逸之文记叙则稍重于屈原在内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王逸《离骚序》对屈原所任职务的记载不是抄撮《史记》的结果，而是有自己的授受源流。

那么“左徒”与“三闾”之职各自的职司是什么？二职到底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它们在屈原的仕途中到底孰先孰后呢？这些无疑是屈原生平中十分令人感兴趣而又不易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三闾大夫”之说并不是王逸时代才出现的。司马迁本人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曾全文引用屈原《渔父》之文，其中即有“子非三闾大夫欤”云云，可见司马迁并非不知屈原曾任这一职务。他所以对这一职务不置一词，当与他撰写《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来源和“左徒”一职的职能有关。

众所周知，司马迁撰写《史记》中战国时期的文字时，相当部份材料直接来源于《战国策》。今本《战国策》中诚然没有提到过屈原的事迹，但是《战国策》的整理者刘向，却在他根据先秦至战国史料所编纂的《新序》卷七留下了一篇屈原的小传。这篇小传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屈原所担负的内政方面的职责。由此可见，战国史料中若有涉及屈原之处，当更多地记叙

① “两大段”之说用汤炳正师说。参见其《屈骚新探·〈屈原列传〉理惑》。

他外交方面的言行。司马迁根据这样的材料来源，以比较多的篇幅记叙屈原的外交活动，并以“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结束屈原全传，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考“左徒”一职，在《史记》并不仅见于《屈原贾生列传》，又见于《楚世家》，记黄歇曾为左徒。但“左徒”之职，实系“左登徒”的省称。1978年5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即有“左𡵚徒”、“右𡵚徒”的简文。按学术界的意见，“左𡵚徒”疑即“左徒”。^①盖“𡵚”即“登”字，“左𡵚徒”即“左登徒”，既可省称为“左徒”，则依例又可省称为“登徒”或“登徒子”。前者见于《战国策·齐策》，后者见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并序》。^②以诸书所载“左徒”职事看，其主要职责当在外交方面。如《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

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

又楚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

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顷襄后期之“左徒”即春申君黄歇。其所长乃在外交：

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秦，约为与国。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③

又《战国策·齐策》载：

① 参见裘锡圭先生《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载《文物》1979年第7期。

② 参见汤炳正师《屈骚新探·“左徒”与“登徒”》。

③ 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

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①

从这些记载中，“左徒”所担负的外交任务可见一斑。因此，虽明知有“三闾大夫”一职，但司马迁却根据他所接触的屈原事迹材料颇偏重于外交工作的特点，仅仅记载了屈原最后担任的职务“左徒”，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三闾大夫”一职，以今天眼光看，竟包含有教育、内政、监察、外交等多种职能，而“序其谱属”更说明这一职务甚至有浓厚的宗法色彩，似乎颇有些不伦不类。但是若以历史的眼光看，则王逸的说法，当有一定来历而非向壁虚构。屈原先祖鬻熊曾任周文王之“师”一职，其职主要为君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措施；协同君王处理战争、祭祀、外交等重大事宜；负责督促贵族子弟学习、修养等。^② 十分清楚，“三闾大夫”正与“师”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故其职能颇多一致。因此，王逸没有囿于司马迁的现成说法，而是更多记叙了屈原内政方面担负的许多重大职责，提到了屈原任三闾大夫之事。

显而易见，以“三闾”、“左徒”二职比较而言，“三闾”

① 1994年6月14日同门刘信芳君据包山竹简，楚职官名从中央到地方有同名者，如中央有莫敖、左尹，地方政府亦有之（参见其《包山楚简职官与官府通考》，载《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一期、第二期）。准此，则屈原、黄歇所任“左徒”当为中央职官，而“郢之登徒”则当为地方官吏。其职级不同，职司则无异。

②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鲁隐公）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又《周礼·地官·师氏》：“师氏掌以嫪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蹕。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一职具更多内涵，其职责涵盖“左徒”，而“左徒”职责更专施于外交领域。就此二职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应当是屈原先担任职责比较广泛的“三闾大夫”一职，然后转而担任“左徒”一职的。零星的史料似乎也能间接证实这一结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说：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

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长子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又据刘向《新序》卷七记载说：

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后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怀

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后放屈原。

上述两书所记大同小异，参合而观之，则屈原因政事（如草宪等）遭怀王疏远，但在此前，既已在楚、齐外交中有所建树，成为两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人物，因而怀王虽疏远屈原，却只是在内政和总理全局方面限制了屈原的职责，而在外交方面却仍然利用了他在楚、齐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与外交才能，让他专门担任这方面的工作。前面已经探讨过“三闾大夫”与“左徒”之职的职能，因此从《屈原贾生列传》与《新序》上述屈原事迹中，不难得出结论：屈原是从职责更为全面的“三闾大夫”贬而任职责单一的“左徒”的。但是应该指出一点，这里所谓“贬”，主要指怀王在感情上对屈原由信任到不甚信任这一事实，并不是说“左徒”在职级上比“三闾大夫”低多少。事实上，刘向《新序》说屈原为“楚之同姓大夫”；王逸说屈原“为三闾大夫”；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可见“三闾大夫”与“左徒”在职级上都同为“大夫”，而职务不同。学术界普遍认为屈原始任“三闾大夫”，只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工作，后来才转而升任“左徒”；或者认为屈原始任“左徒”，被疏远后才贬任职“三闾大夫”。这些看法，很显然，是与上举材料中关于“三闾大夫”、“左徒”二职的职能、屈原活动的大致经历等都不相吻合的。学术界传统的看法大约是受现代社会中负责教育的官员一般地位都比较低这一事实的影响，再加之王逸《离骚序》中谈到屈原经历时，恰恰提到屈原的工作之一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因此不能不从屈原曾担任过级别低于“左徒”的负责教育的官员这一错误的假定前提出发来考虑屈原的经历。这一考虑看似合理，但却忽略了楚国官制与中原各国颇有不同，甚至保留了较为古老

的色彩的因素。

从“三闾大夫”贬而任“左徒”而非自“左徒”贬至“三闾大夫”这一结论，与屈原自己作品中的内容也是相吻合的。众所周知，《离骚》作于屈原被怀王疏远后，而其中专有一段论及教育贵族子弟之事，即所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一段；且整个《离骚》所涉及者几全关乎内政而不及外交，这些情况都说明他之任“三闾大夫”乃楚怀王时。而在被顷襄王流放后所作的《九章》中，才不止一次言及外交事，则显然又与他被流放前任“左徒”，较多参预外交事务有关了。

第二节 内政外交中的“疏”与“放”

屈原所任职务既如上述，那么我想从外交、内政两个方面来探讨屈原的经历。且先来看看外交方面情况。

战国之际，相对强大而具备统一中国实力的，是秦、楚、齐三国。其余燕、赵、韩、魏虽略逊一筹，却也富有活力。因此战国中后期的外交格局是一个以秦、楚、齐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七国纵横捭阖的十分复杂的局面。这当中，只有秦国，不但统一中国的目标明确，而且战略步骤亦十分具体。其首要的任务，即打击六国中力量最强大的楚，以后渐次削弱各国。正如《战国策》记张仪为秦连横游说诸国时所说，“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①事实也是如此，卫鞅（即商鞅）先在魏时，即劝说魏王伐齐、楚（楚宣王二十八年事），待他仕秦被封于商后，更立即对楚发动了进攻（楚宣王三十年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楚国应该怎么办？怀王宫廷中乃有亲秦与联齐抗秦的

^① 《战国策》的《魏策》、《韩策》。

战略分歧。屈原何时任“三闾大夫”一职的具体时间虽不可确指，但他二十岁到二十九岁这一段时间大约正在任上（楚怀王七年一十六年），他是持坚定的联齐抗秦政策的。刘向《新序》卷七载“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时间在楚怀王十六年张仪相楚之前，即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楚怀王七年至十六年这段时间的史实看，齐、楚曾相约伐魏（楚怀王七年事），^①关系似乎确实还好。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十年中，楚对秦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斗争的政策，历史上著名的六国合纵攻秦即发生在这段时间（楚怀王十一年，时屈原二十四岁）。后来虽然发生了楚怀王十五年楚与魏相约伐齐存燕的事，但是从紧接第二年秦惠王专门派张仪来离间楚、齐之间关系这事看，则当时楚、齐之交尚好。因此，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楚国在国际外交方面尚能应付裕如，跟屈原正在三闾大夫任上且坚持联齐抗秦政策当有很大关系。

但是就在此时，楚国的人事发生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意义深远的变动，屈原因为内政方面的原因受谗而引起了楚怀王的猜疑，遭到了疏远。此后屈原在他的工作范围内虽然竭尽全力坚持其联齐抗秦主张，而楚国宫廷之内亦不乏支持他主张的人如昭雎、陈轸等，但似乎再也没有谁像当年的屈原那样与楚怀王有超乎一般君臣关系的亲密感情（详后）而对楚怀王的外交政策能起决定影响。因此从楚怀王十六年（前313）以后，怀、襄两世走上了一条车覆马颠的危险之道。从屈原二十九岁到六十五岁这三十六年间（楚怀王十六年——顷襄王二十二年），楚国奉行着一条以亲秦为基调，而又反复无常的外交路线，先后经历了与秦国三和三战（参见本章末“楚秦和战附

^① 《战国策·魏策》。

表”)的恶性循环阶段,每一和都必然导致一战,最后逐步削弱至于灭亡。这些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证实了屈原所持外交政策的正确和富有远见。

这期间,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任左徒之职后,再度出使齐国。楚怀王二十年(前309年)齐湣王遗书楚怀王,痛陈楚和秦之弊,怀王从昭雎之言而合齐。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楚国外交政策混乱的局面,更没有能导致屈原重被信任。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屈原失势于内政方面。

因此现在来看看屈原的内政方面。

屈原的内政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他自诩的“美政”。^①其主要内容则有法治、励耕战、举贤授能、反蔽壅、禁朋党、明赏罚等等。这些内容在屈骚中一再提出,而学术界已有深入精到研究,^②不必一一在此赘列。值得注意的是,屈原任三闾大夫时,怀王将起草国家宪令的重任托付给了他。以他执拗的性情,必然要将上述“美政”思想无一遗漏地写入宪令之中,这也就必然如春秋战国时诸国变法所共同遇到的情形那样,引来一部分养尊处优,有既得利益的贵族反对;再加之他受怀王赏识,与楚怀王有深厚的感情,又必然会招致一些大臣的嫉妒,这样他在政治上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讦,那就是必然的了。

屈原在政治上的遭受失败,可以怀、襄两君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他的被怀王疏远,如前所述,至迟当在楚怀王十六年(前313)。此前,他与楚怀王有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史记·屈

① 《离骚》。

② 参见汤炳正师《屈骚新探·草“宪”发微》。